

论管理理性的困境与启示

苏 东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全义
版式设计：蒋 方
责任校对：郭_红 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管理理性的困境与启示/苏东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9

ISBN 7-80162-036-4

I. 论… II. 苏… III. 管理学 IV. C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657 号

论管理理性的困境与启示

苏 东 著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7.75 印张 186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3500 册

ISBN 7-80162-036-4/F·34

定价:14.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通讯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100836

联系电话:(010)68022974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理性反思为线索,对正统管理思想进行了批判性考察,旨在有利于我国管理学科发展的自主性,并对我国国企改革以及未来管理学的重构等有所启示。

由于本书作者是在关注理性问题时发现后现代管理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又意识到现代的管理批判学派的思想对后现代管理思想而言是过渡性的,而我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后现代管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本书在探讨理性问题的同时,便自然地形成了后现代与现管理思想和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相关联的体系。在这种知识体系中,读者可以发现,不仅仅是管理理论内容,更重要的是整个管理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整个管理学科赖以成立的理性基础都面临着新的根本性变革。这是一场跨世纪的理论变革。这场变革的意义和影响将是极为深远的。它不仅为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宝藏的重新发掘、为我国管理思想在世界主流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有应有的地位提供了机遇,也有望为我国企业管理体制的创新提供思路。此外,本书并没有皈依于后现代管理理论,而是试图在中西管理思想比较中得出具有理论建构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启示。从如上意义上说,本书是中外管理理论研究上的大胆尝试和前瞻性的有益探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理性与理性主体	(6)
第一节 理性	(6)
一、管理中“理性”问题研究的意义	(6)
二、理性及其吊诡	(9)
第二节 管理主体的理性困境	(25)
一、管理主体的两面性	(25)
二、合法性的困境	(31)
三、管理者行动自由的制度限制	(36)
本章小结	(40)
第二章 战略管理理性	(43)
第一节 对战略管理理性的现代的批判观点	(43)
一、战略管理的理论问题	(43)
二、非正统派观点对理性模型的批判与挑战	(46)
第二节 对战略管理理性的后现代挑战	(66)
一、战略作为话语	(67)
二、战略的系谱分析和话语分析与战略过程方法的不同	(71)
三、对波特模型对象化模式的话语分析	(75)
四、对公司战略话语的系谱分析	(78)
第三节 《孙子兵法》与战略理性	(83)

一、《孙子兵法》与战略管理比较研究应跳出战略理性的圈子	(83)
二、与战略理性相区别的《孙子兵法》的特殊性	(85)
本章小结	(90)
第三章 组织与人本理性	(93)
第一节 管理学人性假设、激励理论的缺憾及对我国 国企改革的启示	(93)
一、人性假设、激励理论与西方社会组织、文化历史 条件	(93)
二、中国社会组织、文化历史条件	(98)
三、有关国企改革	(101)
第二节 官僚制及其他	(106)
一、官僚制与理性	(106)
二、官僚制与西方文明	(110)
三、官僚制与私有经济的雇佣政策	(110)
四、官僚制与自我同一性	(112)
五、官僚制与创新	(115)
六、官僚制的组织理性与企业伦理	(116)
七、官僚制与后现代管理	(118)
第三节 制度主义的多元理性与多种人类组织形式	(124)
一、计算的交往理性与相应的组织形式	(127)
二、几种非计算的交往理性与相应的组织形式	(128)
第四节 规训与监督	(132)
一、权力与规训	(132)
二、人力资源管理与规训	(140)
三、准时制生产/全面质量控制与管理监督	(150)
本章小结	(161)

第四章 组织系统理性.....	(166)
第一节 对组织系统理性的现代的批判观点.....	(166)
一、组织作为系统	(166)
二、一些批判的观点	(168)
第二节 对组织系统理性的后现代挑战.....	(171)
一、引论	(171)
二、组织与过程	(172)
三、自治与控制	(180)
四、系统与边界	(193)
本章小结.....	(204)
总结.....	(208)
参考文献.....	(210)

引 言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道德学说和说教,但企业中仍然存在着很多违反道德的行为,“应该”和“事实”有着很大的反差。既然如此,企业伦理所致力规范说教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既然不能简单地企望用“应该”来规范“事实”,那么对“事实”的规范或管理是在什么层面上进行的呢?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蕴意深刻的问题,连笔者自己也没有想到,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竟已耗用了笔者近5年之久却仍然没有满意的答案,然而它却引出了本书的全部写作。

我国管理思想从古至今都是重伦理的。伦理的属性渗透于我国管理思想的方方面面。而西方的企业伦理学则不然。它是从西方现代管理学中划分出的一门独立的新学科。与其他具体管理学科不同的是,它实际上产生于伦理学与商务理论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伦理学在商务领域的应用。于是,伦理规范的“相对性”限制了这门学科“普遍性”的发展。而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不可避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可避免。于是,企业伦理这门学科难免挣扎于道义和利益的紧张之中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之中。事实上伦理问题是和企业的所有问题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不能将它与管理的整体相分离。在这个意义上,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意义的重新阐释就可能为全新的管理和企业伦理的研究探索一条新的研究思路。这里有必要进行中西管理的对话而不仅是伦理学与商务理论的对话。进一步的研究于是超出了企业伦理的狭隘范围。

建基于“事实”与“规范”紧张关系的思索之上的中西管理比较

研究把作者的思路和视野引向了更深入、更广泛的层次。

由于中西管理的世界观、方法论根本不同,所以不便直接进行比较,而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理论的桥梁。这个理论的桥梁能够使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在保持自主性的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这就需要对赖以建构理论体系的人类理性进行剖析。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心理学、语言学、哲学、文化人类学、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前沿思想和知识,涉及两种文明问题,然而舍此别无选择。

管理本来就不是孤立的,而是植根于文化与文明之中的。只有上升到管理哲学的层次,上升到理性反思的层次才能沟通中西管理。各门学科的划分本来就是人为的事情,有必要超出人为划分的界限而采取一种整体的视角。这种研究有望发掘中西管理体系的偏向之处(不是优点与缺点,也不是以西方管理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更不是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去套用西方管理),从而得出将西方管理批判地吸纳于我国管理理论建树及我国管理实践发展之中的新起点和新秩序。这对我国的国企改革是有现实意义的,对理论发展也同样有着重要意义。我国管理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对西方管理的追随阶段,而追随的大都是其正统派学说,对其批判的传统吸纳的少,更难得的是上升到认识论层面上的反思,而这恰恰是批判地吸收西方管理思想,树立我国管理学科自主性的前提。批判性的管理理论(现代的、后现代的)使我们认识到西方现代管理学的认识论根基不仅并不牢固,而且其实践意义也是有限的。这种认识可以为不同于现代西方管理理性的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合法性和全管理理论的重构敞开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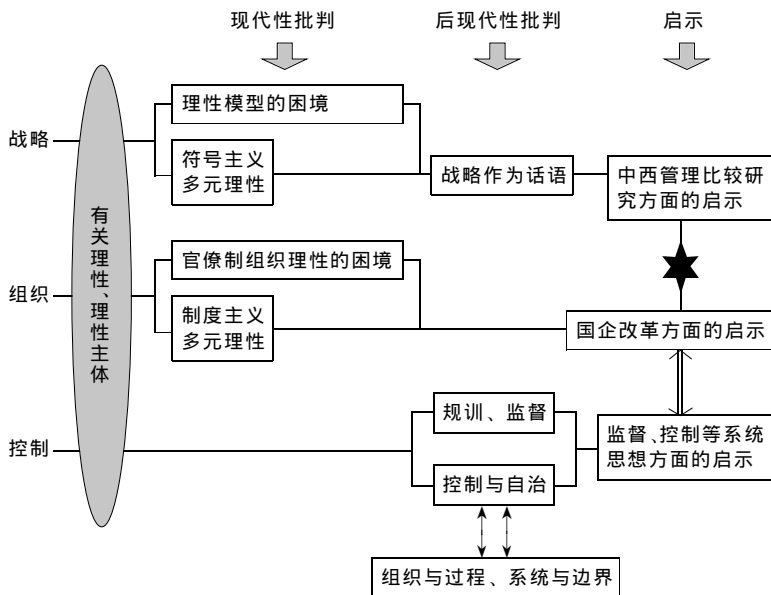
作者的思路本来是以企业伦理为起点的,并将以道德管理为归宿。本书虽然并没有在企业伦理和道德管理上花多少笔墨,但却是建构道德管理的必经之路。因为一个真正的道德管理学是属于21世纪的。它奠基于对旧有体系的全面反思与解构。但愿笔

者的想法和所做的工作能够引起同仁的共鸣,并共赴此艰巨的事业。

本书试图以实用性统领多元性,即对基于不同认识论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论兼容并蓄,以它们对我国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相关性及启示为原则进行研究和编排,这是一种尝试,笔者愿接受各种改进和批评。

本书分别从战略管理、组织与人本管理、组织与系统管理等几个侧面入手,对管理理论本身蕴含的理性分裂与矛盾作了批判性分析。这包括现代性批判和后现代性批判,包括对理论内容的批判和认识论层面上的批判。除此之外,本书还融合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及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现实问题的研究。

本书分四章,它们分别从不同侧面阐述同一个问题,即管理理性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及这种困境对于理论和实践而言都意味着什么。第一章,理性与理性主体。这一章首先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讨论了理性的似是而非,然后质疑了理性主体存在的现实性。该章的内容是准备性的,它为阅读以后各章提供了初步的思想和概念准备。第二章,战略管理理性。这一章首先考察了战略管理领域现代的批判观点和后现代的观点,然后进行了《孙子兵法》和西方管理理性的比较研究,给出了关于中西管理比较研究的独到见解。该章是全文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第三章,组织与人本理性。这一章首先揭示了西方传统管理人性假设和激励理论的缺憾及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启示,揭示了组织理性和人本管理理性的冲突,随后,引入了福柯的权力概念,探讨了其对我国国企监督机制改革的含义。该章是全文的重点。第四章,组织系统理性。这一章分别以现代的批判观点和后现代观点来考察组织系统理性,是最有难度和思想性的一章,也是理解全文的关键。本书的大致结构如图所示。



本书总体结构图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搜集和阅读了大量前人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对管理理性的困境作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索性研究,尤其是有关后现代管理的探讨,目前,国内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国外资料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一些。这是因为后现代管理即使在西方管理学界也属前沿的研究领域。以后现代的观点而言,笔者在解读前人资料的过程中,以一种全新的结构来编排知识,在这种结构的游戏之中引文资料的作者“消失”了,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意义。笔者不仅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对西方管理进行了批判性研究,还在关于中国管理思想和实践方面的思索中丰富了这种研究,尤其丰富了对后现代管理思想的研究,这有助于克服其容易导致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研究无论是在中

国,还是在西方管理学界都可以说是大胆的尝试和探索。此外,本书试图以理论和实践启示为统帅,通过本书的论述,笔者在中西管理比较研究和国企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独到见解。但由于时间和笔者个人能力的限制,在这开拓性的领域,只作了初步的、基础性的工作。受解释学观念的影响,笔者追求的不是逻辑与实证或思想的一致,而是思想的开放性,如果能以此引起争论并能够抛砖引玉的话,那才是真正意义之所在。

第一章 理性与理性主体

第一节 理 性

一、管理中“理性”问题的意义

我国某权威人士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对世界最优秀的管理理论和法则的冷漠和轻视，是中国企业家难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积极热情地引进过许多国外当时先进的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等，然而再先进的管理方法一到中国就走了样，失去了原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即使在有些成功的案例中，它们也不少成了企业领导报告经验的装饰，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来的合理性意义。为什么我国企业没有内在的对世界优秀管理理论应用和学习的动力，为什么我国企业难于推行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原则，为什么在我国企业中难于自生出类似西方的理性化管理，我国的企业管理的合理性体现在何种意义上？……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随着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普遍亏损以及国有资产的流失现状而日益突显出来，这吸引着大批经济学家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研究者，形成了中国经济大论战、文化大论战，而在本应该更有所作为的以管理学为主导的研究领域则呈现出大量尚待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一个困扰着每一位关心中国经济命运的学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不了解是什么因素作为西方管理法则的陷阱而存在，不了解我国“本土”的管理思想在何种观念下是合理的和有价值的，那么任何对西方现

有主流管理的追随和把握以及人为的推动和应用都很有可能失于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境地。而简单地将我国“本土”的管理归为“非理性”而加以否定或肯定,也同样会导致实践的盲目。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着建筑万里长城的集体合作史的文明古国,一向以其悠久的对泱泱大国的统一管理为自豪,以其人文知识和思想为骄傲的中国,没能产生现代的管理学?为什么现代管理学首先肇始于西方?为什么西方现代管理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难于对话、难于比较和衔接?中西管理的融通之处在哪里?这种融通将把 21 世纪的管理学引向何方?……

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必须首先将管理学的研究提升到管理哲学的“理性”研究层次。正是人类的理性建筑了管理的理论大厦并光耀着人类的管理实践。现代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西方整个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无疑是西方自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发展和渗透的产物。“理性”这一词在西方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纯粹而严谨的理性思考,一直是西方思想传统的特色。可以说,“不仅自然科学的成就,整个现代西方的人文学术思想,简直就是植基于理性观念之上”^②。即便是伦理道德的学说,也离不开对人类理性的阐发;即便是非理性主义,也不得不依据严格的理性论证,事实上,非理性主义只不过是理性思维辩证发展中自我变更或自我否定的状况。反理性思想,本身都具有严格而精湛的理性思考训练,其代表人物几乎没有一人真正代表“非理性主义”的情绪化倾向。总之,理性始终居于理性非理性辩证统一体中的主导地位。

管理学是植根于社会的一门学科,是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的,也是西方文明整体的一部分,并带有这种文明或文化的全息特征。而它与其他学科的划分是人为的,必须将它重新放于社会的、经济的、乃至文化、文明的整体之中进行研究才能看到其隶属于那个整体和体现那个整体的固有特征,失去了周围系统的滋养,失去了整

体的关照,管理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将失去其理论活性和适用性。而贯穿于西方现代文明这一整体主线的就是其共有的合理化根源。

在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则缺少类似西方的“理性”的光耀,中西管理思想大相径庭,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在管理研究中人们常难以摆脱这样的困境:或过分执着于中国人文思想中玄远而高妙的一面,或由玄想而转为独断、牵强,对中西方管理思潮不求甚解;或过分热切地拥抱流行的西方思想,跟着人家后面跑,赶时髦,求新潮。这样下去,不但中西管理难以融通,就连自己彼此之间都会有难以深入对话与沟通之苦。这些做法都缺乏对管理学是根植于西方文明的整体性之中的认识,缺乏对西方管理理性的基础与中国管理思想哲学基础的应有的反省、对比与强调。无疑,中国的管理研究要介入世界管理思想的对话和演进,必须以“理性”研究和对比为基础和桥梁,否则就难于形成不偏不倚的共同语言,难于真正消化和吸收不断引入的“舶来品”,而只能成为学术产品的盲目的引进者和消化不良的消费者。在西方管理正统派学说中,理性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对理性的假设是普遍的,“它们以口令(password)的方式起作用,难于逐出或代替”^③,不掌握这一口令或密码,就无法切入西方管理的复杂系统,包括其批判的非正统派学说,因为越具差异性、批判性的学派对理性的把握和批判就越彻底。

正是在理性这个层面上,笔者看到了西方所谓“主流”管理思想的根本意义;正是在理性这个层面上,笔者发现了结合中国管理思想对西方管理进行实质性批判地研究和吸收的可能;也正是在理性这个层面上,笔者更加注意了西方一直伴随着主流管理思想并刺激其发展和变革的管理学中批判的观点,这些观点批判传统管理的理性,直透西方主流管理思想的核心;正是在理性这个层面上,笔者发现了对西方管理理性进行全面颠覆的后现代管理理论

的丰富的蕴含及其对发掘我国古典管理思想宝藏的意义,而这些是我国目前管理学界很少关注或几乎没有注意的。然而它们对认识我国管理思想的自身偏向,对我国管理学科的自主性,以及 21 世纪管理学科发展前景的展望是非常有意义和值得重视的。

尽管有各种理论争议,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始终追求的是其理论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因此,中西管理比较研究有必要最终超脱文化局限而进入管理一般的层次,超脱具体的比较进入到管理哲学的高度,即对管理的理性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起中西管理的对话。对话的结果必然是生产性的,它不应是产生中国的管理学,因为从解释学的意义上讲根本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纯属于中国的管理学,而是产生中国管理学派介入世界主流学术领域的独立自主地位,产生管理的新视野,在这方面基于“理性”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前提性的探险与尝试。我们只有把管理研究推进到对西方管理的理性因素的全面体认和细密省察的层面,才不至于浮光掠影地停留在世界主流管理思潮的边沿,才能真正地介入、积极地对话。中国古典管理思想要受现代科学的洗礼,并不是用西方现代管理改造中国的管理,更不是在方法论上全面推行实证主义方法论,而是在理性论述的意义上脱出神秘主义的玄想窠臼及牵强附会,不沉酣在蒙昧主义或独断中,努力将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纳入世界管理发展和演进的大潮流。

二、理性及其吊诡(Paradox)

1997 年,笔者有幸赴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组建的中美研究中心短期学习。在课堂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美国教授和中国学生为一道有关纳什均衡的周测试题而争论不休,题目是这样的:“两个囚犯可以理性地合作而达到他们利益的最大化(对或错)”,所有中国学生试卷上的答案都是“对(true)”,而教授却认为答案是“错(false)”。争论中显示学生的确已经很好地掌握了纳什均衡,但为什么都没有答对?教授困惑不

解,学生则不肯服输,随后问题集中于“理性地(rationally)”和“合作(cooperate)”这两个术语上,学生们认为只要合作就是理性的,不合作就是不理性,而教授则认为如果囚徒是理性的话,则囚徒独自地理性算计的结果就是不合作。教授一直认为我们是语法理解问题,不断地解释语法,而中国学生对教授的解释均不以为然,认为是一致的,直到笔者偶然地说出“我们”的理性意思是广义的(broadly defined)时,争论才告结束。虽然不能简单地通过笔者的一个经验实例就归纳出中美文化中理性概念的不同,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出,理性概念的模糊性及其内在的自相矛盾。

(一)有关理性的概念

“理性”是西方文化中最突出的一个概念,英语中有两个词都可译为理性,即“reason(原因、理由、动机、理性、理智……)”与“rationality(合理性、推理力、具有理性……)”。事实上,“reason”与“rationality”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两个不同的词,各有不同的含义,“reason”概念源于希腊哲学中的“logos(逻各斯)”,亚里士多德将“逻各斯”界定为一切事理的“终极原因”,他致力于探求宇宙存有的原因并认定任何事物都必须具备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与目的因这四种原因才能形成和存在。通过对这四因的分析,亚里士多德试图推求宇宙存有的“第一原理”、“终极原因”。因此,“reason”这一概念最初兼含“理由”与“原理”两种意义,尤指“终极原因”与“第一原理”。这种理性含义显然是带有本体论意蕴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笛卡儿认为,理性是科学知识独立的和唯一的源泉,是不依赖于经验的判别真理的最高标准。他和莱布尼兹等哲学家都肯定理性可以层层追溯,直到推出最终极的存在理由,即最终极的根本原理。在经验论者洛克那里,“reason”还具有依原理而行演绎的意思。经过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将实践理性与作为自然科学精确性与普遍性保障的理性概念区分开来,理性被净化为纯粹理性),理性的具体内涵与超验的理念,或

逻辑的一致性相联系,从而与源自拉丁文的“思维”(ratio)一词无甚区别,该词意指以概念及推理来认知事物的“理性”(rationality)。“理性的科学”是指遵循逻辑推理的科学。可见理性概念愈益演变,由“终极原因”到“普遍原则”再到“概念推理”,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中,“reason”与“rationality”已趋于同义。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使用的形容词态“rational(理性的)”一词常可用“intelligent”,“logical”,“reasonable”,“sensible”,“sound”等代替,这也是大多数英汉辞典的解释。然而细究起来形容词态的“rational”和“reasonable”之间有较大区分,纯粹的“rational”与“intellectual”(指理智技巧的或技术逻辑的)相关,与正确的证明、为达成给定目的手段以及检验不同立场或叙述的有效性有关。“reasonable”则相反,与合情合理的或有判断力的有关,与价值相关,也即与什么对行为者有利有关,它也涵指目的。由于“rational”与手段更相关,它常被认为是计算理性的。理性(rational)人缺少某种道德感受性,这个道德感受性包括了合作的愿望。“reasonable”则不是这样,它不是从某种经济的、计算的理论理性(rationale^④)中推论而来。在公共监督下,“reasonable”的做法不是以纯粹对自己有利来行事,而是要考虑他人的看法。当然这种区分也不是严格的、固定不变的。

理性的用法在日常生活和哲学中及其他学科中有着很强的相容性。理性的哲学含义具有普遍适用性,能大致覆盖各学科的理性、非理性内涵,而各学科的理性、非理性含义则通常被认为是哲学理性含义的具体运用和引申。

从上可见,西方哲学常把“理性”视为一种认识能力和认识阶段,本义是属于人的心理和认识的范畴,是指人们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思维形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把理性视为同“感性”、“知性”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最高认识能力和认识阶段。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中常把理性当作一种合理的公正